

知識分子的掙扎： 丘世文《周日牀上》的思想和語言^{*}

李婉薇

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副教授

提 要

丘世文（1951-1998）是極具代表性的香港作家，他的成長、知識背景和創作活動，都帶著香港歷史的烙印；同時，他的作品又有獨特性，思想和語言為粵語寫作和香港文學作出了貢獻。在五十年代，家學和傳統師塾教育給了丘世文國學和古典文學的修養，中國傳統文學的仁愛精神對他影響深遠。後來，在香港和法國的求學經歷使他有良好的外語能力，法國哲學、歐洲文學和俄國小說是他終生的愛好。丘氏是戰後在香港出生的嬰兒潮一代，從這一代人起，香港成為可以稱為「家」的城市。作為《號外》雜誌的主要創辦人之一，丘世文的語言觀表現了鮮明的本土意識，主張書寫語言應能表現香港真實的生活和文化，不應獨尊規範的白話文為唯一書面中文。雖然他一直身處商界，但作為會計師合伙人完全無損他作為人文知識分子的眼光和追求。丘世文的代表作《周日牀上》運用兩文三

* 本文為香港研究資助局資助項目「丘世文及《號外》研究：香港七、八十年代的書寫語言及身分認同」（A Study on Joseph Yau and City Magazine: The Written Languages and Identities of Hong Kong in 1970s-80s, 項目參考編號：18606417）之研究成果。陳冠中先生及梁譽齡先生接受筆者的訪問，以及評審的寶貴意見，使本文得以豐富及完善，筆者謹藉此機會表達懇切的謝意。

語作為書面語，表現他的思想掙扎，以及人文精神的嚮往，對今日的香港來說仍然是寶貴的思想資源。丘氏的人格和文學成就一直深受香港學術界和文化界記念，但專門的研究成果不多。本文以《周日牀上》為中心，詳細介紹丘世文的思想、情懷以至人格魅力，並評價他以兩文三語作為一種書面語的語言意識和貢獻。

關鍵詞：丘世文 《號外》 《周日牀上》 粵語寫作 兩文三語 新三及第
香港文學

知識分子的掙扎：

丘世文《周日牀上》的思想和語言

李婉薇

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副教授

一、引言

九十年代初，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出版了兩本商業管理實用讀物，分別為《創業經營法則》^①及《慳稅精要》，^②後者「旨在向非專業讀者介紹本港稅務法的種種特色」。^③在這幾段務實淺白的內容簡介中，最後一段特別強調說：「九十年代精明的決策人，應該認清自己的權利和義務，實行利己利人的政策，享受努力耕耘的成果。」^④從「利己利人」這個詞彙中，隱約流露一種人文關懷。

《創業經營法則》和《慳稅精要》均屬「決策人系列」，二書的「編輯及作者簡介」很能體現丘世文（1951-1998）這位香港作家的獨特性：

系列總策劃及編輯：丘世文

① 丘世文、廖建平合著：《創業經營法則：如何明智選擇業務組織的形式及結構》（香港：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1991年）。

② 丘世文、袁忠合著：《慳稅精要：簡易稅務理財計畫》（香港：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1990年）。

③ 同前註，見該書封底。

④ 同前註。

編輯及策劃委員：梁烈安

廖建平

袁忠

丘世文

香港大學文學士，主修英國文學及比較文學。曾任麗的電視高級行政人員三年，後轉而進入專業會計行業工作。憑業餘自修考取英國公認會計師會（The Chartered Association of Certified Accountants）及香港會計師公會（The Hong Kong Society of Accountants）會員資格。現為本港註冊執業會計師，與合伙人合辦會計師事務所於本港執業。

丘世文一直以多個筆名撰寫不少有關文學、商管、普及文化等文章。著作有《周日牀上》、《在香港長大》及《愛恨香港》等。^⑤

以上的簡介，除了列出丘世文作為會計師的專業資格，還不忘提及他的文學作品，這三種作品全都首先在 1976 年創辦的《號外》雜誌發表。丘世文於 1978 年加入該刊成為總經理，此後長期擔任主要作者、編者。^⑥這篇簡介具體地並置了丘世文作家和會計師的兩棲身分。這種兩棲性，無論在丘世文這位作家身上，還是香港文學史上都有非常重大的意義。這意義可以從兩方面理解：首先，如何在商業社會中實踐文學的意志，困擾一代又一代的香港作家。盡管丘世文從未立志當作家，但在他的作品和思想中，仍然不難發現商業社會和人文精神的深層張

⑤ 丘世文、袁忠合著：《慳稅精要：簡易稅務理財計畫》，見編輯及作者簡介。

⑥ 見梁譽齡在《在香港長大（增訂本）》一書的一則照片說明：「丘世文於 1978 年加入《號外》出任總經理，1979 年 12 月起與陳冠中及鄧小宇合力擔任編輯監督；1978 至 1993 年之間斷續地有十年時間，《號外》編輯部每月的例會皆在丘宅舉行；各人天南地北就把一期的內容敲定，然後（早期）或者會拿起結他夾歌（丘世文 + 黃仁逵 + 岑建勳），或者繼續暢談至凌晨。」丘世文：《在香港長大（增訂本）》（香港：美藝畫報社，2018 年），頁 427。梁譽齡為美藝畫報社創辦人兼主編，近年致力出版《丘世文全集》，已經出版《周日牀上》（香港：美藝畫報社，2016 年）、《在香港長大（增訂本）》及《尤明實錄》（香港：美藝畫報社，2019 年）三種。梁先生不但對丘世文的作品了解深入，而且對丘氏作品的整理和編校十分嚴謹，對丘世文研究貢獻良多。

力；另一方面，香港社會自七十年代經濟起飛以來，專業分工日趨精密，日後像丘世文這樣跨越商界和文學界的寫作形態，在香港作家中更為罕見，因此，丘氏作為「兩棲文人」的獨特性十分值得重視。

香港從作為英國殖民地的一個「商埠」，經過一百多年跌宕的變遷，其主體意識和身分認同在六、七十年代逐漸萌芽，至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中在文藝作品中有明確的表現。丘世文及其他《號外》的主要創辦人都屬嬰兒潮一代，他們見證了、也參與模塑了這個過程。^⑦ 在七十年代中對書寫粵語、採用口頭和日常語言仍然比較保守的語文環境下，他們已經勇於、樂於追求書寫語言應該能夠表現專屬香港都市的生活節奏和精神面貌，以及這個轉型期的文化衝突。同時，丘世文是《號外》全人中最具語言意識的一位，他筆下的文體也最多樣化。他的知識背景和文學趣味形成清晰而系統化的文學觀，並對粵語以至兩文三語作為書面語、作為文學語言作過的重要實踐。在思想方面，他的代表作長篇小說《周日牀上》流露深廣的人文關懷，成為他在作品中不斷地召喚的一種理想。

⑦ 《號外》的中文全名為《號外城市雜誌》，英文名稱為 City Magazine。關於《號外》和香港的城市身分，呂大樂教授有十分準確詳細的描述：「對香港的『戰後嬰兒潮一代人』來說，『城市』一詞曾經特別有意思。香港曾經是一個港，有時更來得直接，叫僑港。在小說、漫畫裏，叫埠，香港是 H 埠，澳門就叫 M 埠。何謂沒有個性、認同，這個埠的概念應該說明一切：進出之間，是埋埠、過埠。城市，不同於港、埠，因為 CITY 便有 CITIZENS，而更重要的，是 CITIZENSHIP：公民有他們的權利。我不是說七十年代中期的香港社會已經出現了公民權利的概念（殖民地政府視香港人為 RESIDENTS，好自為之），但卻開始成為一種由下而上的要求。」緊接著，他還提出香港不再單單是政治的角力場，香港有自己必須處理的議題：「第一期《號外》於 1976 年 9 月出版。而剛好在一一年之前，香港觀察社成立。雖然兩者並無關係，但卻有一個共通點：不再停留在舊有那種左右派（在香港，意思是親中共 VS 親國民黨）的二元化政治對立的思維，而以香港為立足點，提出一個本地社會的議程。〔……〕簡單一句，香港人已不甘心於只當夾縫——國共之間、中英之間——的群體；香港社會可以自成一體，有獨特的性格。」見呂大樂：〈《號外》：一個香港文化的故事〉，《號外三十——城市》（香港：三聯書店，2007 年），頁碼不詳。

二、生於商業城市的人文知識分子

丘世文在 1951 年生於香港，其父丘東明在 1914 年生於廣東省海豐縣，1950 年逃難來港定居至終老，育有八名子女，三子為丘世文。^⑧ 丘世文三歲起入讀私塾五年，八歲轉讀喇沙小學二年級，直至大學預科 12 年內一直就讀於喇沙書院。他在中六時從理科轉讀文科，因為兄長經常逼他對誦莎士比亞名劇及十九世紀浪漫派詩歌。他於 1971 年考入香港大學英國文學及比較文學系。^⑨ 關於丘氏的學習經歷，有兩方面值得說明：首先，丘世文無疑是當時精英教育中的資優生。香港在 1971 年才開始逐步推行「九年免費教育」，在丘氏求學的五、六十年代，不但中學教育尚未普及，中文大學也在 1963 年才成立，之前只有香港大學極少的學額；更重要的是，丘世文既有家學及私塾背景，具備傳統國學及文學修養，又在大學專修英國文學，這樣的求學經歷代表香港戰後轉折時期的歷史和文化。在其後的六、七十年代，香港經濟發展迅速，教育制度日趨規範，像丘世文這樣的學習經歷比較少見。

丘世文的傳統學養，除了來自私塾的基礎教育，家學和父親對他的影響也非常深遠。丘家具備讀書傳統，丘東明八兄弟中有兩人是作家，其中一位是戰爭文學作家丘東平（1910-1941）。丘父也十分重視文化修養，據丘世文說，「無論家境怎樣貧窮也不許賣書」。在他小時候，父親很喜歡把他抱在膝上，教他吟唸〈鄭莊公掘地見母〉、〈滕王閣敘〉等古文名篇，母親有時也和他對誦《唐詩

⑧ 丘東明：《一九二零年代長洲生活記趣》（香港：美藝畫報社，2018 年），頁碼不詳。

⑨ 以上資料綜合美藝畫報社為丘世文撰寫的生平簡介，以及丘世文在《在香港長大》的自我介紹。前者見該社為丘世文設立的專屬網站「世道文心」（<https://yausaimanjoseph.tumblr.com/yausaimanjoseph>）（上網檢索日期：2021 年 12 月 7 日。）以下所引「世道文心」網站皆依此版本，除有必要者，不再說明。後者見胡冠文：〈在香港長大的胡冠文〉，《在香港長大》（香港：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1986 年），刊於扉頁後，頁碼不詳。胡冠文是丘世文其中一個筆名，在《號外》創辦初期，是陳冠中、胡君毅及丘世文三人的名字各取一字合成的，但後來多由丘世文使用，以「胡冠文」為作者名稱出版的作品，著作權均屬丘世文。

三百首》和《千家詩》，他自己也喜歡唸背《識時賢文》。因此，他五、六歲已經記得不少傳統詩文，還「動輒琅琅不能自休」。¹⁰ 丘世文的記憶力在友儕間十分著名，摯友譚國基醫生曾說：「他學識淵博，記憶力更是驚人，我自問記憶力很好，鮮有敵手，但對他也甘拜下風。」¹¹ 事實上，他在孩童時期已經表現出博聞強記的傳統文人氣質和能力。和他最投契的二兄丘自強也曾說：

世文自小聰明伶俐，記憶力驚人。未入學時，已從父親口中學曉不少古文及詩句。年紀輕輕，千字文、識時賢文、唐詩等，已是琅琅上口。大概他天生與文字有緣，從小便喜歡看書。只記得他於孩提時期，已是手不釋卷，連環圖、《兒童樂園》、《格林童話》看個沒完。猶記得他於溽暑天時，仍整天埋首看書，而且習慣性地用五隻胖短的手指間歇地往上唇搔癢，一天下來，上唇竟也紅得似猴子屁股。（《顧西蒙的信》，頁3）

由上述的回憶可知，丘世文和傳統知識分子略有不同的是閱讀興趣廣泛以至龐雜。丘世文六歲時，伯父轉送他們家一大批舊書和雜誌。這些書刊的種類和內容都很龐雜，既有《兒童樂園》、《三毛流浪記》、《幸福》和《良友雜誌》，也有林琴南和張恨水的小說、豐子愷和嚴以敬的插圖故事，亦不乏古典文史哲書籍。當時丘世文「尤其喜歡」的幾本類型也很不同，例如吉拉斯的《新階級》、邵康節的《梅花易數》、蘇曼殊半譯半著的《悲慘世界》、巴金的《溫暖人間》、甚至邱清泉的《徐蚌風雲勁旅》等。值得一提的是，丘父對這批舊書刊珍而重之，找了木工做了個六層高的小書架，安放比較完好的，比較殘舊的就放在露台鐵皮屋子裏的雙層牀上。露台的圍牆上還有籬笆，丘父還對他們兄弟幾人說

¹⁰ 丘世文：〈我的書緣〉，《看眼難忘——在香港長大》（香港：青文書屋，1997年），頁75-76。

¹¹ 譚國基：〈鴻雁十七年〉，收於譚國基、丘世文：《顧西蒙的信——譚國基與丘世文鴻雁十七年》（香港：青文書屋，2000年），頁40。以下所引《顧西蒙的信——譚國基與丘世文鴻雁十七年》（簡稱《顧西蒙的信》）皆依此版本，僅於引文後標明書名及頁數，除有註明之必要者，不另作註。

了解縉的故事，又欣慰地指著那竹籬說：「我們也稱得上門對千竿竹、家藏萬卷書呀！」¹²

1974年畢業後，丘世文因為「醉心法國的存在主義及希望追隨羅蘭巴特，考取了法國政府獎學金到巴黎第四大學高等研究院攻讀博士課程」，¹³一年後中途輟學返港。箇中原因，一方面是由於小學同窗好友周立基患上癌症，丘世文深受打擊，急欲照顧朋友，加上課程和理想不符，當時學運、罷工又對學習造成很大阻礙，於是心灰意冷，放棄留學。¹⁴返港後在麗的呼聲電視台任職行政工作，在1976年和周立基之妹、青梅竹馬的知己周雅麗結婚。在1978年，丘世文因為兒子夭折再次承受沉重打擊，¹⁵於是辭去電視台的工作，轉而自修會計，並與友人合辦會計師事務所。同年7月應《號外》創辦人陳冠中邀請出任總經理。丘世文對《號外》十分認真而且充滿期待，他曾經提及在開設會計師事務所時，更令他雄心勃勃的是和陳冠中合辦《號外》和一山書店。¹⁶《號外》創辦初期一直十分拮据，丘氏全力協助，不但把部分存款投資到《號外》，還租出自己事務所的一小部分給《號外》辦公，與陳冠中、胡君毅三人「全職經營」。¹⁷《號外》是作家丘世文出現的重要契機，1979年開始發表連載小說《周日牀上》後，他的創作力一發不可收拾，以顧西蒙、胡冠文、舒靜川、趙思宏、葉承敏、游若絲、

¹² 丘世文：〈我的書緣〉，《看眼難忘——在香港長大》，頁76-77。

¹³ 丘世文生平簡介，見「世道文心」網站。（上網檢索日期：2021年12月7日。）

¹⁴ 丘世文曾對摯友譚國基剖白心路歷程：「一九七一年考進了香港大學，選讀了英國文學和歐洲比較文學，閒來兼讀了法文，畢業前幾個月考獲了法國政府獎學金，於是一九七四年中畢業後立即往巴黎擬選讀法國文學，無奈當時我一心想隨從的 Roland Barthes 和 René Étiemble 都不願意辦比較文學，於是我只有被迫先留在巴黎第四大學高等研究院攻讀中國比較文學。我不喜歡被迫做事的，雖說那是博士課程，但如果沒有真正的興趣，徒得虛銜也是枉然的。大概一年後我突然接獲在英國的那位童年摯友染上癌病，急忙趕往英國安慰他。至此，我是心灰放棄了獎學金，於一九七五年回到香港來，俟年底才恢復勇氣進電視台工作。」（《顧西蒙的信》，頁55）

¹⁵ 丘世文夫婦在1986年育得一子，取名丘士山，見「世道文心」網站。（上網檢索日期：2021年12月7日。）

¹⁶ 丘世文：《同行四分一世紀》（香港：突破出版社，1998年），頁45。

¹⁷ 出自1982年12月丘世文給譚國基的書信，該信未著具體日期，見《顧西蒙的信》，頁98。

游思韻、遲敬意、連城子、呂立本、尤明等多個筆名寫作多種文體，產量豐富而題材廣泛，大部分的文章都表現他對香港流行文化、語言、教育、社會政策等各方面的觀察和諫議。丘世文的代表作品除了《周日牀上》外，還包括散文集《在香港長大》、《愛恨香港》及《看眼難忘——在香港長大》、《一人觀察》，以及文體上極具獨創性的語錄體作品《尤明實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同行四分之一世紀》和《顧西蒙的信》二書，前者是丘世文因為好友陳修治醫生患病而主動為他撰寫的一部小傳，後者則是他給知己譚國基醫生的書信合集，對了解丘氏的思想和創作都十分重要。

會計師兼作家的身分貫穿了丘世文整個寫作生命。對此，美藝畫報社創辦人梁譽齡認為商界的見聞對他的文學創作有一定的助力：

丘世文並非以寫作維生，最初給《號外》寫稿沒有稿費，他寫作純粹為興趣，他亦是《號外》最多產的作者。除了九十年代他在《明報》寫過專欄，他的作品絕大部份都只是在《號外》發表，而他是《號外》的股東，基本上他喜歡寫甚麼就寫甚麼，不用與其他人交代，所以他作為作家可以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日頭上班，夜晚寫作。畢業後他在電視台的人事部工作，當中的觀察和經歷成為《周日牀上》的情節；後來他創辦會計師事務所，每天接觸商界人士，所見所聞就成為《尤明實錄》。其實文藝青年與商業社會格格不入是必然和必須的。¹⁸

文藝青年如何在香港覓得自己的園地，一直是艱辛的旅程。丘世文走出了一條特別的道路，在他之前和之後的香港作家中都甚為罕見。香港是商業城市，對商界有所了解方能為大部分香港人寫心，丘世文的會計師身分讓他有這樣的優勢；難得的是，他一直保持文人的情懷和眼光，能夠既在其中又在其外，思考和刻劃香港人在商埠、商業都會的歷史命運中形成的集體性格，並表現他作為人文知識分

¹⁸ 根據筆者在2019年8月28日對梁譽齡先生進行的訪問。訪問在香港教育大學B3-1F-29室進行，由蔡漢斌記錄及整理，訪問稿尚未發表，全文由梁先生在2020年7月30日校訂完畢。

子的人生觀和世界觀。

1997年10月22日，丘世文在身體檢查時發現右腦有腫瘤，27日動了切除手術後證實是腦癌。翌年10月21日病逝，享年47歲。丘世文在病中仍然繼續撰寫《同行四分一世紀》，並為青文書屋出版的《看眼難忘》、《周日牀上》合訂本及《一人觀察》撰寫序文。《看眼難忘》的〈序上序〉寫於病中休養的日子，文末記述他在東區醫院遇上一群大學生，並說：「他們朝氣勃勃，英俊美麗，心中不期然產生出一股多年未曾有過的喜悅——未來，總是屬於繼起的一代的——我衷心為在香港長大的華人幾十年來的成就感到驕傲和欣慰。」¹⁹譚國基認為這裏流露了他的仁者情懷：「即使在生命最低潮痛苦中，還是對世界有一種廣泛之關懷和希望。」（《顧西蒙的信》，頁48）這種關懷和希望也寄託在《周日牀上》層次豐富的思想掙扎中。這部小說並不是愛情故事那麼簡單，也不止是表現白領階級的生活和處境。筆者認為真正的主題是知識分子在現代商業社會面臨的思想掙扎，對人作為存在主體的拷問，以及對仁愛作為希望的探尋。這部小說的自傳性質，不單在作家本人的背景和性情，更在於其思想。（《顧西蒙的信》，頁62）

三、世俗的懸崖與仁愛的彼岸

《周日牀上》由1979年8月至1984年11月在《號外》連載，是丘世文最重要的代表作品。根據美藝畫報社的版本，²⁰全書分為57篇，各篇敘事完整但

¹⁹ 丘世文：〈序上序〉，《看眼難忘——在香港長大》，頁碼不詳。

²⁰ 本文選用美藝畫報社的版本，因為這個版本經驗細心整理。比如《周日牀上》的最後一篇，在《號外》發表時和在博益出版單行本時並不相同，丘世文把原為第四十八篇的〈天涼，好箇秋〉調至最後，並抽起第五十六篇〈秋來那些〉，梁譽齡在整理時維持〈天涼，好箇秋〉作為最後一篇的位置，同時補一上〈秋來那些〉。梁氏的考慮和說明詳見：〈有關《周日牀上》修復版的篇目次序〉，《周日牀上》，頁560-561。在美藝畫報社的版本之前，除了《號外》的連載版本之外，《周日牀上》有兩個版本：《周日牀上》（香港：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1985年）及《周日牀上續集》（香港：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1986年），作者署名均為顧

又互相扣連，第一人稱獨白式敘事既能讓現實世界通過敘述者的眼光充分展現，又能真切地流露敘述者內心的各種情緒。敘述者顧西蒙（Simon）是大學畢業不久的青年，在商業機構任職部門主任約有一年半。^② 故事內容一方面以他的辦公室生涯為主軸，表現七、八十年代香港白領階層的眾生相，另一方面通過顧西蒙的囑語，旁觀、反思商業社會世俗化的人際關係和價值觀，並思索人生應否有更超越的追求和意義；而籠罩全書的是顧西蒙對遠赴英國求學的女朋友 Mary 的思念：Mary 會不會回來，應不應該去找 Mary，是不是和 Mary 結婚就好？作為整部小說最重要的隱喻，顧西蒙和 Mary 的關係寄託了丘世文作為知識分子的掙扎、省思和理想。敏感、多思又高度自省的顧西蒙一直徘徊在兩個世界之間：一是公司代表的商業世界和世俗生活；一是 Mary 代表的精神世界，可以視為大學時期的自由生活和理想追求的延續。小說中的確有不少篇幅在刻劃和批評商業世界的慾望和道德問題，同時否定世俗化的生活蠶食內在精神追求。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小說展開，顧西蒙並不完全肯定或否定任何一個世界。一方面，他有時對努力求存的同事們不無同情和理解；另一方面，他認為精神世界一旦落入現實世界，其中的美感和理想都可能幻滅。由於整部小說以描述公司的日常瑣事為主，愛情線索雖然貫串全書，但一直似有還無，因此，吸引讀者的並非故事情節，而是敘述者時而惆悵、時而豁達的聲音，以及起伏迴盪又充滿質感的思想。簡言之，也就是丘世文把人生追求、人性本質置於香港這樣商業化和世俗化的語境時作出的深刻思考。

在第五篇〈人壽經紀〉開首，顧西蒙這樣自白：

我總認為星期一至星期六的自己，是夢遊的人，公司就好比是夢境，而其間發生的一切就彷如毫無邏輯、難以駁接的夢中瑣碎細事；只有星期天一

西蒙；以及《周日牀上的顧西蒙》（香港：青文書屋，1998年），作者署名為丘世文。以下所引《周日牀上》皆依香港美藝畫報社版本，僅於引文後標明書名及頁數，除有註明之必要者，不另作註。

② 見《周日牀上》，頁43。顧西蒙提到自己「畢業後出來辦事轉眼亦有年半了」。

覺醒來，懶洋洋地臥在牀上，才是真正夢醒回復真性的時候。（《周日牀上》，頁 54）

以莊周夢蝶的邏輯比喻分裂的自我，明確地表示現實世界是使他失去「真性」的地方。總括來說，這個世界的問題在於慾望和世俗化，前者摧毀了敘述者的道德標準和人格想像，後者使精神的自由和追求歸於無有。不過，儘管敘述者以知識分子的氣質表達了對二者的憎惡，但他也同時指出二者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他自己也有陷於其中的時候。

《周日牀上》的思想主題，主要通過兩組對照人物呈現：Jenny 和 Mary 以及 Michael 和 Simon，兩組人物的背景、性格、人生觀等都有極大反差。因為 Mary 既是理想的象徵物，又是顧西蒙的第二自我，²²Jenny 和 Mary 這一組人物對概括全書思想內容尤其重要。Jenny 完全爲了反襯 Mary 而存在，確如丘世文的知己譚國基醫生說，「Mary 是不可打擾的性靈，Jenny 是肉慾」。²³小說的第一篇〈秘書 Jenny〉中，作者在簡略交代 Jenny 的背景和她如何成爲顧西蒙的秘書後，立即描寫她的身材，表現她對敘述者在性方面的吸引力：「沒有人願意坦白承認 Jenny 是美麗的：壯健的大腿、扁闊的臀部、渾圓的腰和雙臂，要不是她屬於高頭大馬那類型，她一定會失掉了現時擁有的那股原始吸引力。」顧西蒙還曾在給 Mary 的信中，半開玩笑地說 Jenny 是他「新認識的女朋友」，形容她有「Renoir 畫中的女人們那種嫵媚」、「她會令男人想起冬天客廳火爐的溫暖、飯桌上的美味佳餚、生兒育女的慰藉以及平庸自得的樂趣。」這代表世俗生活的溫暖、實存和生機勃勃。但是，對於顧西蒙來說，Jenny 除了不大上進，沒有好好學習英文，老把「annual leave」說成「anal leave」之外，更重要的問題還是頭腦上的：

²² 這一點下文將詳細述及。

²³ 見譚國基給丘世文的書信，《顧西蒙的信》，頁 114。原文為「欲慾」，筆者訂正為「肉慾」。

Jenny 也許就連荷里活版本的《齊瓦哥醫生》也看不懂，一生也未曾聽過哥德、莎士比亞、卡夫卡、魯迅、福樓拜、卡繆、杜思妥也夫斯基是誰，但談起臺灣、七星巖、星馬泰、芭提雅、大丸、松阪屋、龍子行、海運大廈，她卻是無一不曉的。（《周日牀上》，頁 28）

也就是說，Jenny 對高深的文學及其思想、關懷一竅不通，但對於香港的購物中心、短途旅行等資訊卻瞭如指掌。Jenny 顯然不能像 Mary 成為顧西蒙「無所不談」²⁴ 的對象，但顧西蒙也不是沒有想過 Jenny 可以是一夜情的對象。在第九篇〈新春自省〉中，顧西蒙自白說：「斜眼看見她（按：指 Jenny）背著我那寬闊的肩膊和渾圓的臀部，好幾次我就衝動得想邀她吃飯、看電影，也許，看電影後找個方便的地方彼此方便一會兒。」但之所以沒有這樣做是因為：「問題是一定要厚顏善忘到底！」（《周日牀上》，頁 94）必須同時指出的是，Jenny 的身體和她所誘發的慾望有一種兩面性——雖然不無一夜情那種性慾的罪惡，但更多時候卻是代表世俗生活的豐富和實在。顧西蒙因為自己心中無法逾越的道德界線，沒有陷於罪惡的性慾；但同時又因為追求靈性伴侶而懷疑世俗生活的選擇。因此，顧西蒙沒有自以為高潔；反之，他經常抱怨自己不能從俗。在第七篇〈老實說，我不再明白〉中，顧西蒙就自悔為「正規教育所累」，「習慣了不假思索循規蹈矩，服從著前人認為是聰明的典範和美德，才致陷於現時的窘境。」（《周日牀上》，頁 75）

丘世文能夠把他作為商界中的知識分子的經驗和憂思形象化地再現，Mary 這個人物的獨特設計十分關鍵。僅僅存活於顧西蒙的絮語中的 Mary 幾乎是個沒有身體的人物，而且因為和現實生活有一定距離，顯得非常虛無飄渺；Jenny 卻是顧西蒙朝夕相見的秘書、現實生活的一部分，她豐滿的身材同時代表世俗生活和性慾。兩位女性的反襯鮮明且強烈。但筆者想指出的是，因為顧西蒙複雜的思想掙扎，並不絕對地肯定或否定任何一個，因此沒有流於簡化的二元對立。

²⁴ 《周日牀上》，頁 206。

Mary 只出現在顧西蒙的記憶和獨白裏，她在文本時間的範圍內從未作為人物出現和活動。除了詢問 Mary 到底什麼時候回來、回不回來之外，顧西蒙經常回憶的是二人交談的情景，提到兩人的身體接觸僅及於牽手，而且極少述及 Mary 的外貌，雖然提過她的美，但重點在於其熟悉感：「這美麗的面容好像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彷彿是前生、遠古——曾經邂逅窺見過呢？」（《周日牀上》，頁 373）Mary 是能夠和顧西蒙作深入的思想交流的靈魂伴侶，她了解、欣賞顧西蒙的脫俗、聰明、敏感。她個性剛強，顧西蒙曾說：「認識了 Mary 這麼多年，我也未曾見過 Mary 流過半點眼淚。」（《周日牀上》，頁 243）她有一顆仁愛的心，並對人性美善、對光明的未來有堅定的信念。在第十三篇〈永遠希望〉中，顧西蒙引述 Mary 的書信中的一段話：

……為什麼你總認為希望是沒有可能的事呢？讓我告訴你一段生活的感受吧！前幾年冬天，夜裏我走過近機場的行人隧道中，偶然看見一對瞎眼的乞丐夫婦在彈琴賣藝，而他倆的兒女們，手持著小罐子忙著問沿路的行人討錢。當時我順手掏出了一枚硬幣來給了苦纏著我的小孩，匆忙中卻瞥見令我至今難忘的他那雙淚水晶瑩、充滿感恩的眼睛。你細想想：這一代瞎眼的、活在暗無天日中的人們，還可以寄望於下一代，還可以有一絲一毫的希望，只要他們能熱愛生活……（《周日牀上》，頁 129）

小說中不常長篇引述 Mary 的書信，這個片段十分珍貴而重要。孩子感恩的眼神是 Mary 的仁愛引發的，雙方的美善顯然是作者指向的希望所在。Mary 誠然是理想世界和價值的象徵物，丘世文在給摯友的書信中，把 Mary 稱為但丁的繆斯比亞翠斯。他認為，但丁在「紛亂邪惡堪與現代匹比的黑暗時代末期」，比亞翠斯「使他堅信這世界還有希望，令他熱愛這悲苦短暫的生命」。丘世文不但曾說顧西蒙「沒有可以作為肯定的價值和信仰的根基」，「只有咫尺天涯

的 Mary，她的奇特的愛」是他「唯一的精神支柱」。²⁵他問道：「那麼，生在二十世紀末的我，為什麼不能在虛無幻滅的苦劫中，透過現代式的比亞翠斯——Mary——而永遠希望呢？」²⁶但是，顧西蒙對 Mary 並非一味肯定和追懷，反而經常流露一種不知所措的彷徨：有時懷疑她所代表的理想能否存活於他身處的現實中，有時不懂如何向 Mary 說明他在現實世界的苦衷，覺得她並不真正了解「生活」。²⁷必須提及的是，顧西蒙在小說中有一次形容 Jenny 時，也提到比亞翠斯：

她是那麼實在、直接、濃豔、肉感、不透明，看見她就不期然地感到但丁為比亞翠斯自尋煩惱不單止是遺害至烈，而且還是活該的。（《周日牀上》，頁 67）

並讀丘世文和顧西蒙的話，可以明白，Mary 和 Jenny 代表理想和現實不能調和異質，以及由此而來的矛盾。Jenny 曾經激發顧西蒙的性慾，但和 Mary 的性關係卻不願提及，丘世文這樣提示讀者：

²⁵ 均見《顧西蒙的信》，頁 63。

²⁶ 見丘世文在 1982 年 12 月給譚國基的信，同前註，頁 99。這裏書信中提到「永遠希望」一詞也是上引第十三篇的標題。

²⁷ 據此，Mary 也是顧西蒙思想上的對手，不妨視為顧西蒙的第二自我。第二十二篇〈如何告訴 Mary〉中，顧西蒙回憶二人散步時看見木棉樹，Mary 這樣說：「據說，木棉樹總能超越它身旁的一切，它的本性在於不斷超越環境，所以也叫英雄樹。」意指顧西蒙可以不受物慾橫流、道德淪喪的環境影響，堅持自己的思想和原則，也超脫世俗化的生活和標準，與其他人並不一樣。但顧西蒙並不以這樣的高姿態作為自我形象，他眼中的木棉樹孤單而尷尬：「我不忍，從來都不忍直率地告訴 Mary，無論她怎樣用心良苦、怎樣慈悲為懷，事實總是無視人願而自成事實的。就好比，昨天下午走過地鐵站旁看見的那株木棉樹一樣，萎縮在巍然矗立的三十多層高樓的陰影中，腳下凋零幾顆還未開透的花蕾，枝桠無光可憐兮兮的樣子。」通過木棉樹，丘世文形象化地表現知識分子人生選擇的兩面性：獨異而高潔，本來就免不了孤單而尷尬。（《周日牀上》，頁 207。）

細心的讀者，總能看出顧西蒙與 Mary 在未分別前是曾有過肉體上的愛的：但顧西蒙始終不願意——連想也不願意提及。有一次，他甚至提及自己缺乏實際性經驗，但那應作沒有如一般男人隨意濫交解。總之顧西蒙潛意識中總認為他與 Mary 的愛仍未 consummate——為什麼是這樣想只有留給讀者猜想好了。（《顧西蒙的信》，頁 63）

在這裏，兩人之間的性關係和婚姻可以被視為世俗化的隱喻。顧西蒙對於讓 Mary 回來、和她結婚始終非常猶豫。雖然顧西蒙參加小職員輝仔的婚禮時也曾羨慕他的平凡小家庭；但和大學同學李景文和 Helen 夫婦聚會時，卻對他們過於喧鬧庸碌的父母生涯、二人消失殆盡的氣質深感驚訝和惋惜，隨即又自我質疑：「但會不會這就是天倫之樂？誰不要替下一代付出代價？我怎能斷定他們不是自有其中的樂趣？至少他們有所歸屬、有所寄託、有所希望、有所維繫，不似我孑然一身〔……〕」（《周日牀上》，頁 133）理想實現時，甚至在理想實現的過程中，必定有被世俗同化的可能。因此，吊詭的是，理想沒有實現，反而代表理想不會被世俗化，理想永遠不會失去作為精神支柱的功能。

另一組對照的人物是 Michael 和 Simon，前者是商場老手，後者是大學畢業不久的文藝青年，在學歷、價值觀以至人生追求等方面南轅北轍。作者藉著 Michael 表現商業社會中扭曲的人格和關係，並與顧西蒙的善良、為人設想形成強烈反差。Michael 是典型的香港「世界仔」，識時務、應變能力強、懂得把握時機，在商業社會的遊戲規則中如魚得水，是丘世文眼中一種常見的香港人特質。學歷是 Michael 不願向人提起的隱痛，他從低層做起，非常服膺商業社會的遊戲規則，擅長在這些規則中求存。因為顧西蒙的學歷比較高，升職會比較快，Michael 對他有點忌諱，一直很在意維持和顧西蒙的良好關係。Michael 所代表的商業世界價值觀，權力慾是主要的一種。小說中有兩次事件，具體地表現 Michael 的權力慾。在第九篇〈新春自省〉中，丘世文把性慾和權力慾並置，除了記述 Jenny 引起顧西蒙一夜情的幻想之外，還寫到 Michael 喜歡賣弄權力。Michael 的上司到美國視察，他代任部門主管幾個月，卻對顧西蒙擺起了上司的架勢，令二人關係一度緊張。作者寫到 Michael「徐徐地從辦公室椅站起來，從

檯上撿起日常拆信用的古銅刀子來，搖晃著刀尖」（《周日牀上》，頁 36）對顧西蒙說話，這架勢激怒了顧西蒙。Michael 的架子顯然在試探顧西蒙的底線，看見他發怒，Michael 立即軟化，而顧西蒙立即心軟內疚：「心登時軟了一大半，而且還懊悔自己為什麼要生氣。」（《周日牀上》，頁 37）剛剛投身社會工作的顧西蒙沒有大義凜然指責 Michael，更多的是自悔感情用事。但是，他也說：「出來社會做事就好比下棋，要投身其內就得遵從一切既定的棋例：象行田，馬行日，原是從來沒有人片刻疑問過為什麼所以然的事。」其中「沒有人片刻疑問過為什麼」，仍然可見他的不滿和失望。

另一次事件是關於公司新來了一位中層管理人員黃金來，在公司推行不少新政，令 Michael 十分反感，且深感生存空間受威脅，打算在會議上揭露黃金來工作上的失責，在總經理面前告他一狀：「好，實行整蠱呢條俗佬！噏！Simon，下次 executive meeting 我就响老細面前話班 telephone operator 遲到早走，成日都有人駁電話，等佢預番次鑊都好！」（《周日牀上》，頁 210）Michael 向顧西蒙提出這樣的計劃時，他剛剛聽著黃金來興趣勃勃地講述「活吃魚」怎樣鮮味，只覺噁心反感，一時衝動在言語上鼓勵了 Michael 的計劃。Michael 的計劃十分成功，雖然顧西蒙不算幫凶，對黃金來的指控他並沒有和議，但他仍然深感歉意，想懇求黃金來的寬恕。顧西蒙對「活吃魚」所代表的世俗化享受不以為然，但對於渾然不覺地承擔了生活的無奈、被權力遊戲的競爭扭曲的人們如黃金來，懷有淡淡的悲憫和同情，又不無自我懷疑的精神：

而更令我懊悔不已的，還是有天周末下午路經公園的時候，偶然間瞥見遠處黃金來一家大小在玩耍拍照。我不敢走上前與他打招呼，透過周圍的鐵絲網，我暗裏望著黃金來蹲著逗戲女兒拍照，樣子是那麼仁愛和藹，不時間還舉頭與稍露疲態的妻子相視而笑，一家人是那麼樂也融融。他的妻女們可知道他為謀生曾受的冤屈？抑或那是天倫樂應付的代價，他們早已慣於接受一切而不自知？而他們可曾知道，參與欺負他們的人，那一刻竟是在旁冷冷觀看，甚至羨慕自慚莫敢踏足上前打擾他們的小天地呢？（《周日牀上》，頁 215）

顧西蒙形容黃金來「仁愛和藹」，隱約可知他所不忍的，是辦公室政治等權力慾對人性美善的擠壓和損害。

對小說中呈現的思想主題分析至此，筆者希望通過丘世文的思想進一步說明《周日牀上》中寄託的理想和希望。1982年9月28日，丘世文在信上告訴摯友譚國基一個消息：

上星期，雜誌社接到了台灣聯合報副刊主編痲弦的來信，說十分欣賞近期的一篇〈自作多情〉，希望我們答允准以轉載讓當地廣大讀者群認識顧西蒙。我的內心實在喜悅不已的，那並不因為被賞識的虛榮所致：說實話，如果來信者是王雲五或者是蘇雪林，我可真不知要怎樣反應才對——大概會立即停寫封筆了卻寫作生涯。然而來自痲弦，這卻是令我振奮的。我相信他明白，猶如你明白，〈周日牀上〉不是一篇聊以取悅一般消閒讀者的小說。其實，它是我現階段花費最多心思寫作的文學作品。²⁸

在上述引文中，筆者一方面想指出丘世文和痲弦先生的一段因緣，像很多同代和之後的香港作家一樣，他也在台灣找到知音；另一方面也想指出《周日牀上》的重要性，以及丘氏對於不被理解的苦悶。這種苦悶，很容易被誤解為不過是象牙塔裏的文人曲高和寡、孤芳自賞的情結。但丘世文並非這樣的文人，他不但以憂患意識和關切眼神緊盯香港的教育、語言和社會變化，而且思想十分開明，對各種現象和論述，在有自己鮮明的判斷的同時，也抱著開放和接納的心態。同時，他長期身兼會計師和作家的身分，會計是商業社會高度發展的代表行業，顯然他並沒有把商業和文藝絕對地對立起來。然而，即使如此，仍然有一種本質性的苦

²⁸ 見丘世文在1982年9月28日給譚國基的信，《顧西蒙的信》，頁89。丘世文並不十分欣賞五四新文學，雖然有時提及魯迅和阿Q，但作為一位作家，影響他的思想和作品的主要是歐洲哲學、文學和俄國小說；作為人文知識分子，丘世文接通中國古典詩人的悲憫情懷。在這裏，「王雲五」和「蘇雪林」僅僅是作為新文學的符號，沒有針對性意義。「停寫封筆」云云，是否真的付諸行動並不重要，而是背後激烈的情緒表明他渴望得到知音。

悶鬱結，深植於他的靈魂裏。筆者認為，這種「本質性的苦悶鬱結」和香港在殖民統治下成爲一個高度商業化的城市是分不開的。

在知己譚國基面前，丘世文不時流露自己的「異質」。這種「異質」，是他作爲獨立個體相對於香港社會整個文化狀態和集體價值觀而言的。在二人正式通信之始，譚國基的信中已經表現了他對丘世文有深刻了解。譚氏在信中說丘世文有些像「《The Idiot》中主角 Prince Myshkin」，並說：「現今社會中，大概也是難以容下像 Prince Myshkin 這樣高貴無瑕的人，難免你也常有落寞之感（你也應該寂寞的，在香港而看 Dostoevsky 者，千中無一）。」²⁹ 對此，丘世文回覆說：「你說得十分貼切，生活在香港，精神上的確是很寂寞的。」³⁰ 但他並沒有因爲自己的異質而自怨自艾，或者對眼前現實心存怨怒，他並不覺得與別不同就是美德。³¹ 相反，他仍然滿有仁者心腸。譚國基說他買《號外》主要原因是愛讀丘世文的專欄，因爲「文章中常常洋溢著仁者情懷」。譚氏認爲丘世文爲人「有很深的 empathy，對人的不幸、困境，常有身同感受之慨，而有時明知不能有什麼成果，也試著幫幫人。」³² 他甚至認爲這是丘世文和其他作者不同之處：

從八月份的《號外》，就可看到你與其他《號外》作者之不同。那期專題是「學嘢潮」。不論其他人表面文章如何，但從中信息卻可看到其自大一面〔……〕而你不同，你真正的關心人，你真正的去勸人，去幫助他人，而愛的本質，其中包括著正是渴望其成長，幫助發揮其本身潛質，所以我受感動，而寫信給你，我相信一定有不少讀者有同樣感受〔……〕³³

²⁹ 見譚國基在 1981 年 9 月 9 日給丘世文的信，《顧西蒙的信》，頁 51。

³⁰ 見丘世文在 1981 年 9 月 16 日給譚國基的信，同前註，頁 54。

³¹ 丘世文曾解釋顧西蒙的痛苦和快樂是「他無時無刻不為意著異於常人並不等於什麼美德，亦不能引以自豪，再者，也許自己是出於不曉隨時代發展習慣了異於常人而已」。見丘世文在 1981 年 10 月 12 日給譚國基的信，同前註，頁 63。

³² 均見譚國基在 1981 年 9 月 9 日給丘世文的信，同前註，頁 51。

³³ 同前註。

在丘世文的思想中，悲憫、仁愛是很重要的價值。他完全繼承了中國古典詩人典型的人格和情懷。丘氏說他在中四時讀杜甫的〈北征〉，已經深深為之感動，而且終生難忘：

我想，什麼也不及那其中的意象所能深刻給予我杜甫那種悲天憫人和泛愛的精髓：詩人，就是在兵荒馬亂、流離困死、生不如死的道途中，還能從大自然中窺見「甘苦齊結實」的真理。我相信只有古希臘悲劇中 *All is Well* 的概念才能與這裏的境界相提並論——為的就是那份成熟悲壯和深厚的感情，一種對生無論如何的重新肯定。³⁴

丘世文作為人文知識分子的孤獨處境和仁愛思想，在《周日床上》有所再現。這部小說以「混合拍拉圖式和原慾於一體的愛」，³⁵ 形象化地表現顧西蒙無法割捨諸種理想和價值而承受的寂寥、懷疑、苦悶等精神痛苦，以及隨之而來的關於世出世間的掙扎。讀者必須從小說中的囁語讀出作家的省思，才能觸及愛情故事和社會眾生相下真正的主題，包括人類真正的需要和應該追求的是什麼、商業社會的有情無情、精神滿足和世俗生活的衝突等等。

譚國基以形容丘世文的「empathy」來形容顧西蒙，他認為顧西蒙以悲憫的眼光看待他身邊的同事，對商業社會、現代都市下遭到扭曲的人性心存憐惜和溫愛：

顧西蒙的精神，不是對乎個人而發的，而是感到人性尊嚴受屈辱的人的 vulnerability 而難過，不論是敵是友。而這種精神，也是近乎釋迦、耶穌的聖賢之心。本來人人心底也有一份聖賢之心，但可惜多數已是日久蒙塵，難得一現光芒，所以我看到有一期 Michael 將吃剩的叉燒包包起來給一隻流浪狗而深受感動，這也是《Brothers Karamazov》書中的一個

³⁴ 見丘世文在 1981 年 12 月給譚國基的信，《顧西蒙的信》，頁 109。

³⁵ 見丘世文在 1981 年 10 月 12 日給譚國基的信，同前註，頁 63。

onion。³⁶

因此，丘世文並非強化文學和商業的對立，或者抱怨商業操作扼殺了文學，反而超越了這種對立，在表現人們在商業社會的行為和價值觀的同時，挖掘他們深藏於靈魂的美善的一面。但是，關於小說中的同情（empathy），還有另一個甚具代表性的例子。顧西蒙和同事們到醫院探望病危的同事譚爺，目睹譚爺的狀況，顧西蒙久久不能釋懷，但和他同去的同事們卻完全不同：

他們怎可能那樣子漫不經心說話？就好像譚爺的苦痛與我們無關，走出醫院來不單止可以毋須黯然有物傷其類的悲戚，還竟然可以那樣子高談闊論，說著儼如有了倖免生病死亡的特權才膽敢說的閒話呢？（《周日牀上》，頁 359）

顧西蒙在這裏感到不解和憤怒的正是同事們對病苦中的人缺乏同情。對於在現代都市、商業社會打滾的人來說，這樣的情緒可能毫無意義甚至矯情，但從人文主義的角度看來，卻是冷漠、疏離、利害計算導致人對他人的痛苦無動於衷。

丘世文用「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來形小說中懸置的愛情，並說：「如果要簡單地說，那麼恐怕我就只能說：問題就在這凌亂複雜的時代，而我的主角竟還那麼偏執真誠地去找尋失落的理想。」³⁷又說：

顧西蒙與 Mary 之間就是一個現代心靈和脾性在現實生活中對正邪善惡的永恆掙扎、其間有理想和現實的矛盾和諧、有美與醜的糾纏互生、有冥想與實行的衝突相益、有堅信與絕望的拉扯折磨、有是非正反的變幻莫名、有靈與慾的抗衡與超越……一切，都是那麼透過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瑣事隱喻著〔……〕（《周日牀上》，頁 100）

³⁶ 見譚國基在 1982 年 8 月 10 日給丘世文的信，《顧西蒙的信》，頁 84。

³⁷ 見丘世文在 1982 年 12 月給譚國基的信，同前註，頁 108。

作家把他作為人文知識分子所相信、追求的價值，置於功利、充滿競爭和慾望的商業化場景中，仰望和思念的卻是泛愛、靈性、無私。這些兩極之間是否有融合或平衡的可能？在這裏，商業化的存在處所仿如人間、俗世的象徵，敘述者有時能置身事外，或冷眼旁觀，或悲憫同情；有時又身陷其中，感到世俗、平庸，以至放縱慾望的引誘。丘世文並沒有在小說中給出這些大哉問的答案，所以他說：「可以說《周日牀上》是表達了一個現代城市人力圖找尋一己的世界觀心路歷程的片段。」³⁸

四、複調語境中互相激活的兩文三語

為了表現顧西蒙作為抒情主體的內在掙扎，丘世文選擇以書面化的兩文三語寫作《周日牀上》，成為這部小說在語言方面的重要特色。這選擇既能反映香港實際的語言情況，又體現了丘世文作為《號外》全人的語言觀。³⁹這部小說的敘述語言為白話文，對話主要為粵語，但英語的角色也不容輕視。小說中的白話文實有雙重角色：因為第一人稱敘述者也是主角，白話文除了作為敘述語言，交代敘述者的所見所聞外；還屬敘述者的獨白之音；二者的風格頗有不同，後者不無感傷浪漫的韻致，和生活化的粵語、英語形成強烈對照。小說中的不少篇章都以顧西蒙抒情的語調開始，有時思念 Mary，有時懷緬過去。這些段落很能代表白話文的作用，即通過景物和感官的描寫，營造感傷、懷戀的情緒，表現顧西蒙浪漫敏感的性格。例如：

躺在牀上凝望著細雨綿綿灑在玻璃窗上，積聚的水珠不斷溶落滾瀉著，這種煙霧瀰漫的初春天氣，總令我想起：縱使間我能大哭一場，心裏還是情緒安寧自若，就好比，在這霧霞滿布、泣淚的玻璃窗後，我仍是那麼安詳，靜躺著凝想。（《周日牀上》，頁 206）

³⁸ 見丘世文在 1981 年 10 月 12 日給譚國基的信，《顧西蒙的信》，頁 63。

³⁹ 下文將詳細述及這一點。

這種春天的氣候，令顧西蒙想起和 Mary 在杜鵑花和木棉樹中散步聊天的情景。第十五篇〈愛莫能助〉的開首，則以感官帶動童年回憶：

蒙著頭睡醒仍是捨不得毅然起牀來。我喜歡漂洗後的被褥，那股潔淨芳香的味道，那種生硬割膚的感覺，矇矓中總能把往事勾現得親切，要我憶起小時母親清早替我穿衣上學的溫柔依偎，要我想起走路回校時那漿燙得綑硬的白粗紡布的刺肉難受。（《周日牀上》，頁 143）

上述的白話文展示了顧西蒙文雅溫柔、纏綿悱惻的內心世界，與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粵語和英語所代表的現實世界。這兩種語言是香港的商界白領階層的主要語言，作者經常以 Michael 略為粗俗、語氣強烈的粵語表現他那市井、自大、自作聰明的形象。在第五篇〈人壽經紀〉中，Michael 教顧西蒙以斬釘截鐵、不近人情的手段拒絕保險經紀：

還是 Michael 比我老於世故，當我問及他有關介紹來的保險經紀時，他一臉諧謔表情說：

「條友梗係話自己係我嘅老友嚟嘅啦！係唔係？佢死緊你買人壽保險哩！咁你有冇買㗎？」

我不好意思說他星期六會送交一份保險建議書給我，只好婉轉地問 Michael 怎樣對付那推銷經紀。他面露洋然自得的神態說：

「挑！嗰條友上次俾我玩到盡，仲窒到佢飛起，以後連電話都唔夠膽再打嚟。對付呢啲咁嘅 sales 佬你一定要咁㗎！如果唔係，口水多過茶都唔知要講到幾時。」（《周日牀上》，頁 62）

在這個例子中，作為敘事語言的白話文比較平實，Michael 所說的粵語非常直接而激動，加上兩人不同的情態，一個小心翼翼，一個躊躇滿志，使語言的感情色彩互相撞擊烘托，產生單一語言所沒有的趣味。此外，小說的粵語也不全用來刻劃 Michael 這種略為負面的人物形象。在最後一篇〈天涼，好箇秋〉，粵語是家

人之間熱鬧地開玩笑的語言，也是父親「突然和藹非常地」對顧西蒙說話的語言：

「呃，講起存在主義者，嗰日我睇咗阿妹你書架上面嗰本書先至發現原來存在主義同我哋道家嘅精神咁相似嘅！以前我就係俾望文生義呃晒添！我而家明白嘞！其實道無古今中外嘅！天下百慮一致，殊途同歸，所以話開卷有益啫！我呀：其為人也，發奮忘食，好學不倦，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㗎！〔……〕」（《周日牀上》，頁 495）

比較 Michael 和父親的說話，雖然兩段同為高度口頭化的粵語，但前者市井色彩無疑比較濃厚，箇中的關鍵在於詞彙的選擇。Michael 口中的「挑！」、「條友」、「玩到盡」、「窒到佢飛起」是比較粗俗的詞彙，父親口中卻有四字詞和文言句子，能代表他們大異的個性和背景，在同為口頭粵語的基礎上，衍生不同的語感和風格。

《周日牀上》的英語所佔的篇幅雖然比白話文和粵語少，但卻有重要的地位。首先，它給小說帶來真實的白領生活氣息。小說中的高層管理人員的英語雖然也夾雜粵語，但比較多完整句子；中層管理人員的粵語卻多夾雜英語單詞，而且英語的發音有時不準確。小說中一次正式的會議很能表現作家這種運用英語的方式：

總經理閱覽日常公文副本看得厭煩，於是在會議中疾言厲色質問了：

「K.T. and K.L., I've received a hell lot of a memo copies from you two lately. What's all these staff number and salary questions about?」

登時會議席中靜默了好一會兒，各人都屏息意味著惡鬥的開始，注意力完全集中在 K.T. 甘和黃金來兩人身上。

「Our Monthly lacord of total staff number doesn't laconcile.」終於才由黃金來先開口把問題說了。

「What monthly total staff number is there to reconcile?」總經理摸不著頭腦

四顧問道。

「冇嘢，」還是 K.T. 甘的表達能力較強，面不改容地以他一貫頑固的語調說：「我哋兩個部門每個月份都分別做一份 staff turnover report。阿 K.L. 家陣話我哋計出嚟嘅總數同佢計出嚟嘅唔同，實情好簡單啫！我嘅 computer paylow sit 係 off 咗啲月中遞信辭職同埋入唔切月尾上工啲 staff 之嘛！」（《周日牀上》，頁 239-240）

總經理的英語完整準確，帶著權威和質問的語氣，兩個中層職員的英語中 lacord、laconcile、paylow sit 應為 record、reconcile、payroll sheet，都是發音不準確的詞彙。在上述例子中，英語和粵語一起建立了生活的真實感和職員之間的緊張氣氛。顧西蒙的白話文敘述比較中立客觀，僅在評價同事的能力和神情時流露了一些主觀情緒，可見兩文三語以其異質互相碰撞，又互相補足。

第四十二篇〈大限來時〉⁴⁰ 集中了整部小說經常出現的內容，也非常完整地表現兩文三語的使用情況，頗值得注意。這篇文章並置上一代對故土的懷戀和香港人在九七回歸前急欲移民的情況。開首四段述說在床上睡眠朦朧時見到童年記憶中的畫像：「威風凜凜的古代將軍，或者是可憐兮兮的漫畫小丑。」但是這些畫像總是因為睡姿稍有變化而消失無蹤，令顧西蒙悵然若失：

就如湊近了這急景殘年、灰黯和濕冷的氣氛時令總給予我一種怪難形容、既淒涼蕭索又充希望的感覺那樣。如果真的要設法以言詞表達，這種古怪的心境就好比年青人看晚霞織綿的美麗感到夕陽無限好那份早老的情懷——雖則真切無以復加，卻還是種無端陣過的美感經驗而已。（《周日牀上》，頁 386-387）

以略為優美感傷的白話文描繪舊時舊物不可追懷的悵惘和無奈。之後繼續抒發懷

⁴⁰ 《周日牀上》，頁 386-395。

舊情緒，回憶周末午飯後閒逛到小時候唸書的學校附近，對沒有改變的和改變了的街景店鋪都有一番感受。傍晚在父母處吃飯，母親提到在戰亂中結婚、生育、分離、逃難的感受：

後生時點識得諗咁多嘢吖！總以為鄉下嘅家緊要啫！而且你爸爸去到那邊都寫信託人寄錢番嚟養住頭家嘅；打仗走反時就有辦法啦！夫妻好比同林鳥，大限來時各自飛！阿弟你話係咪呀？

讀者不難體會和想像母親追憶往事時的溫和而感慨的語氣，除了敘述者「有所感觸而發」的提示，粵語豐富的句末語氣詞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後來敘述者回憶秘書 Jenny 忙著辦移民手續時說：

哎喲！而家都好似人心惶惶咁，辦定手續先都有蝕底吖嘛！第日有乜事叫起手都有地方去，唔使話好似《投奔怒海》班越南難民咁！睇見都嚇死人呀！

感歎詞和比較急促的節奏也能傳達不同的語氣和情態。午飯時聽到職級較高的同事談移民計劃的粵語則夾雜不少英語，總經理的特別助理 Yvonne 的粵語有較多完整英語句子：

我諗都係 Australia 好咯，there's no such thing as compulsory military services, you see。我都諗過㗎嘞！至少 The Soviet Union 有日本阻住，and anything happens there the States is bound to intervene 嘅！我 husband 都係咁話。

市場經理 Patrick 的英語更為碎片化：

打仗仲係小事！States 啲 tax 就慘死咯！好似我而家揸綠簿仔咁，稅務局

追到我暈。你知 U.S. 係 world-wide income basis 㗎啦！我响度做事又要俾百分之十五稅，個邊又要俾百分之五十稅，冇個 accountant 同我瞞稅呀，唔使等第日都死先呀！

縱觀以上扼要的分析，丘世文選擇的語言平衡了藝術化和生活化的兩種要求。粵語和英語直錄口頭語言的性質甚為重要，職員等級和英語碎片化的程度不一定完全反映現實，而是為了塑造不同的職員的形象和語氣。白話文藝術化的功能較大，浪漫感傷的獨白語言對表現敘述者的人格很有代表性。在整部小說中，顧西蒙也曾說英語和粵語，但為了突顯顧西蒙思想和價值觀的異質，他絕大部分時間「說」白話文。

白話文、粵語和英語並用，除了可以視為書面化的兩文三語之外，相對於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流行一時的「三及第」，這種「新三及第」以英語取代文言文。^④ 這變化在香港文學和粵語寫作兩方面都有極深遠的意義，而《周日牀上》和《號外》的部分文章都是「新三及第」主要的代表作品。作為《號外》的骨幹成員和嬰兒潮一代，丘世文的語言意識和身分認同、書寫語言的發展息息相關。在七十年代中後期，儘管香港社會上「兩文三語」的語言環境已然具備，但教育和文化活動對書面中文的要求仍然以規範白話文為正統，陳冠中、鄧小宇及丘世文等《號外》全人認為不足以反映香港獨特的都市生活。陳冠中在這方面的主張可謂得風氣之先：

香港早已有了一套自己的書寫語言，只不過我們還沒有決定如何評價它。電視及廣告是城市語言的倡導者，它們的成功證明了城市語言的表達能力。印刷媒介則猶豫不決，雖然我們日常言談間免不了運用香港獨有的語

④ 「新三及第」一詞在學術界偶有提及，但未被明確定義。在本文中，筆者取其狹義：僅指《號外》及丘世文筆下兩文三語的文體。「新三及第」未必為丘世文及《號外》首創，但他們使用這種書面語化的兩文三語背後強烈的本土意識則獨特而重要，帶著香港歷史變遷和文學發展的深刻烙印。

句，但到了官式談話及書寫的時候，我們又覺得許多字句唔多妥。只有印刷媒介才可以將富有創造力的生活口語變成可讀的文字。「號外」在這方面亦嘗試了。⁴²

陳冠中認為香港已經有了一套自己的語言：書寫的、城市的語言，而且，他認為印刷媒體應該跟上這種語言發展的步伐，因為口頭語言要轉換至書寫語言才能走上文學發展的道路，都是十分有穿透力的洞見。雖然這裏沒有涉及文學語言，但他提出書寫語言也應有表現香港這個獨特城市的能力，這主張卻十分清楚。儘管《號外》全人的語言風格並不相同，但他們同樣強烈反對「語言大一統」、「淨化中文」，到了九十年代仍然如此。在《號外》創辦十九周年時，丘世文提到他在七十年代初就受到巴赫金的影響，先是被其「跨學科的治學方式、對話及雙聲與複調等文化理論所吸引」，其後「狂歡慶典」的概念也影響了他：「狂歡化是對話所處的時空裏重要的因素，在文學的呈現在於眾聲喧嘩」，並說：

⁴² 陳冠中：〈城市語言〉，第30期《號外》（1979年2月），頁5。陳冠中先生在接受筆者訪問時，為當年的這個主張作了詳細說明：「我當時說這番話的時候，其實已經存在粵語書寫意識，指出我們的口語其實會影響我們的書寫。無論什麼階層，日常生活中都是說粵語。但是，《號外》的語言較多反映精英階層的語言和生活，想表達的就是粵語並不一定是低俗的。我們和當時的三及第不同，他們有文言文，也有粵語，但基本上以書面語為基礎。而我們的寫作，可能語句結構上已經以廣東話為基礎，再摻雜些英文。關於粵語對書面語的影響，我們當初是想捕捉時代的感覺：我們需要創造一些語言來建構一個難以形容的香港新現實，所以就想嘗試用不同的語言去描述。當時香港的精英階層在交流時已經有自己的一套說話，但是在當時的流行文學作品中沒有反映到這個現象。」陳冠中說的「語句結構上已經以廣東話為基礎」，是十分準確的描述，七、八十年代《號外》的文章無論哪種語言風格，無不如此。陳氏同時指出，七十年代的淨化中文運動對《號外》造成一定的壓力：「我們被人罵的信，內容十分凌厲，滿是粗口，批評我們的中文狗屁不通。當時又遇上余光中的純正中文運動，而我就以理論的角度回應，指出根本不存在所謂的純正中文，只是大家的表達方式不同，寫的好不好是視乎內容，而非形式。當時我們每個人都寫許多不同風格的文章，有粵語書寫的，也有書面語寫的。」訪問在2019年9月27日由筆者於香港科技大學星巴克咖啡店進行，並由蔡漢斌記錄及整理，訪問稿尚未發表，引用內容在2022年6月21日得到陳冠中先生的電郵確認無誤。

大概由於巴赫金影響的缘故，參與辦理《號外》以來，我一直不反對任何中西並用，文白夾雜的文風，自己更以十多個筆名嘗試以不同的筆觸風格寫作：如顧西蒙《周日牀上》，胡冠文在香港長大的生活寫照，遲敬意的普及文化論、舒靜川的學術批評、趙思宏的商管科學，乃至被譽為低級趣味極致《尤明實錄》等等。⁴³

丘氏並非以語言混雜為批評標準，他立即指出這樣的作品當然不一定都會成為經典，他真正反對的是「自封的主流正聲」，並認為「在語言及文化的領域裏，我們需要眾聲吵鬧的現象才可以辨別到美音」。⁴⁴ 反對獨尊白話文為單一書面中文也好、以英語取代文言文也好，《號外》全人由這角度參與確立香港文學的主體性。筆者想強調的是，嬰兒潮一代這種語言立場，本身即為身分認同的表現：必須以香港的語言表現香港的生活和存在處境，陳冠中對此有明確表述。他在為博益出版《號外》全人作品的「城市筆記」系列撰寫序文時，故意以〈宣言〉為題，並表現出鮮明的本土意識。他明確地說「我們寫的是香港」、「是我們熟悉的香港」，並說：「這裏的作者對香港有執著。那些心態上客居、過境、初到或跟愛人暫踞於此地之類的作家，當然亦有權發表對香港的意見，但大致不會在這系列的書中出現。」⁴⁵ 這裏提到那些移民一代的作家，和戰後在港成長的一代在身分認同上有重大分別。《號外》一直沒有統一的語言風格，在七、八十年代，同一本雜誌因為涉及三種書面語言而呈現紛繁以至雜亂的局面，但編輯們對缺乏整體感毫不在意。《號外》全人不曾提倡哪一種語言為理想的語言，他們宣示、追求的是一種對語言完全平等開放的態度，他們自信地視之為一種創造自由。這樣的語言觀表現了「複調語境的語言意識」（Language Awareness in

⁴³ 丘世文：〈略論《號外》語言風格的問題〉，第226期《號外》（1995年7月），頁碼不詳。由於本文刊於該期附刊（也斯主編：《香港文化》特集），全書未著頁碼。

⁴⁴ 同前註。

⁴⁵ 均見陳冠中：〈宣言（代自序）〉，《太陽膏的夢》（香港：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1986年），頁碼不詳。

Heteroglossia），這個詞彙是筆者根據巴赫金的複調理論自行發明的概念，⁴⁶用以說明寫作主體在不同語境能夠運用不同的語言表達創意、思想和感情，對於不同的語言帶來不同的風格和藝術效果有充份的掌握，以一種有容乃大的氣魄進行語言的錘鍊和熔鑄。筆者認為，丘世文是具備這種意識的香港作家。

雖然從四十年代起，報章上連載的三及第小說已經流行一時，但粵語作為一種社會上流通的書寫和印刷語言，在七十年代末還沒普及。在這背景下，《周日牀上》全書對話使用粵語彌足珍貴。⁴⁷同時，不可不注意的是，回顧粵語寫作的發展，可以發現，在丘世文筆下這種書面化的兩文三語明確地成為文學語言探索的手段。粵語作為書寫和印刷語言的歷史雖長，但其中對於作為文學語言的探索的文本卻較少。在清末民初時期，粵語寫作的功利色彩強烈，流通於廣州和香港的白話報上，粵語被視為啟蒙工具，包括宣傳種族革命、改良陋俗等。在香港的四十至六十年代，三及第小說十分流行，粵語在這些作品中的運用固然也具備文學價值，三及第小說也是香港文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三及第小說的寫作目的比較商業化，丘世文則說《周日牀上》不是「取悅一般消閒讀者的小說」；同時，三及第小說的文言文代表廣州文人對當時香港報業和文化的影響，丘世文則自覺地以生活化、本地化的語言再現生活，表現作家個性化的主體思想，背後的語言觀充滿強烈的本土意識。

⁴⁶ 筆者的主要研究領域為「粵語寫作」（Cantonese Writing），在拙著《清末民初的粵語書寫》初版的總論中初步以巴赫金的理論說明不同語言之間互相激活的創造力的重要性。《清末民初的粵語書寫》在2017再版時，筆者在後記中正式提出「複調語境的語言意識」：「肯定香港特殊的語文環境，把白話文、粵語、英語，以至文言文、潮語、網絡語言全都視為創造力的資源，強調使用者在發揮創意時充份意識這些不同的資源有不同的特性和功能，對它們一視同仁地運用。」見李婉薇：《清末民初的粵語書寫（增訂本）》（香港：三聯書局，2017年初版；2021年二版），頁412-413。在2021年第二次印刷的增訂本中，筆者在後記再作了進一步說明，見該書頁410-411。

⁴⁷ 陳冠中在接受筆者訪問時也指出：「《號外》的書寫亦是以標準書面語為基礎，只不過加入了英文和粵語的字眼，從來沒有人說要寫純粹的廣東話，當時也缺乏讀者群。」因為上述的語文背景，他以「新的突破」來形容《周日牀上》的粵語對白。訪問稿引用內容在2022年6月21日得到陳冠中先生的電郵確認無誤。

五、總結

丘世文在 47 歲時英年早逝，但是，從童年的五十年代，到晚年的九十年代，他走過香港三個極為關鍵的歷史階段，給予他非常豐富而全面的材料以表現和思考香港的問題。丘世文在戰後的香港出生，五十年代的香港社會，經濟因為外來資金迅速恢復中，但從香港文學作品看來，香港作為「我城」的身分尚在模糊狀態。這期間在香港出生的嬰兒潮一代，不但在六十年代成為社會的經濟和文化動力，並且建立以香港為家的身分認同。經歷六七暴動後，英國殖民政府有意塑造香港身分，這段時期是香港社會和文化發展的分水嶺。七十年代經濟起飛，八十年代香港的文化多姿多采、充滿活力；八十年代中期，已然確立的身分認同在文藝方面有很豐富的表現，但是，中英聯合聲明和回歸問題又給香港蒙上一層迷霧，集體心理、社會議題和八十年代初有很大分別。九十年代媒體工業急速發展，文學和文化事業生存空間萎縮，1997 年則是香港回歸的歷史時刻。可以說，丘世文經歷了這個香港故事多次重要的轉折和變遷，而他也以自己的才華和思想，作了深刻而獨特的回應。

在丘氏的作品中，其代表作《周日牀上》對粵語寫作和香港文學都有可貴的貢獻。無論表現思想還是語言，以至人物塑造和篇章結構，丘世文經常運用反差、對比、並置等手法，顯示他眼前的世界和思想中的世界不無矛盾，使這部散文化、抒情化、去中心的小說，雖無情節衝突，卻充滿思想衝突和語言衝突，吸引讀者思索和玩味。在思想方面，這部小說流露了商業社會中知識分子的掙扎，並寄託了對悲憫、仁愛等人文精神的希望。小說中的顧西蒙很容易被誤解為無病呻吟、虛偽矯情。他既欣賞世俗生活的生氣淋漓，又深恐這種生活方式的庸俗膚淺消解精神滿足的追求，但同時又懷疑這樣的追求落於空談，在現實世界可能無立錐之地。他經常徘徊在兩個對立的世界而無所歸依，「凡事總得尋根究

抵」，⁴⁸ 缺乏光明確定的信念和熱情。但是，筆者認為，《周日牀上》是身兼會計師和作家的丘世文獨特的思想結晶。從商埠到國際金融中心，香港一直無法擺脫重商主義的命運，商業化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深刻地烙印在香港文化以至香港人的血肉中。會計師丘世文在商界的第一手見聞，令知識分子丘世文滿懷憂思。有論者指出，香港的青少年未必喜歡《周日牀上》，因為缺乏書中描寫的生活經驗。⁴⁹ 筆者想補充的是，香港的成年讀者也不容易理解顧西蒙——《周日牀上》可以被視為一部知識分子的小說，若在價值取向方面深明世與我相違的孤獨感，同時深感商業價值對人性的損害，才可能成為丘世文和顧西蒙的知音。雖然如此，丘世文當年對商業社會中道德問題的批判、對人文價值的召喚等思想，對今天的香港仍然有深刻意義，筆者盼望能被今天的香港人細心記取。

在語言方面，《周日牀上》以書面化的兩文三語寫成，充分配合充滿張力以至矛盾的思想內容，還實驗了三種語言互相激活下的多種可能性。和丘世文的散文相比，這部小說的白話文更為規範，很少摻雜粵語或英語詞彙，這樣使三種語言的差異更為鮮明。白話文同時作為敘述語言和獨白語言，風格很不同，但對小說敘事和人物塑造都很重要。丘氏以英語和粵語真實而活潑地再現香港的複調語境，充滿強烈的生活氣息。在使用粵語時，以不同風格的詞彙、語氣詞、感歎詞和節奏感，配合背景和身分不同的人物，或多或少能使同為高度口頭化的粵語也有細微的差別。英語的運用使《周日牀上》成為一部「新三及第」小說，放在香港戰後粵語寫作的發展脈絡來看，它代表粵語寫作中多語、雜語的取向，並表現

⁴⁸ 在《周日牀上》第十三篇〈永遠希望〉中，顧西蒙自責說：「我真心惱恨自己為什麼凡事總得尋根究柢，不能像 Mary 那般對生活自然而然地充滿毫不矯飾的信念。」（《周日牀上》，頁 127）這和另一篇〈老實說，我不再明白〉中他「惱恨自己」的話可以互相發明：「為什麼不能忘記讀書時候學回來的那一套不切實際的學識，硬要用它作為量度世事的準則，不喜歡這樣，不喜歡那樣，弄得自己幾乎近似禁慾的苦行僧一樣。更痛苦的還是，我不是為著什麼信仰真理而修行，而是不知所謂的苟存著而已。」（《周日牀上》，頁 74）這裏的「信仰真理而修行」應該是指宗教信仰而言。

⁴⁹ 張錦滿：〈月旦社會 理性趣味兼備〉，《周日牀上》，頁 555。原刊於 1998 年 12 月隨《號外》附送的特刊《記丘世文》中。

《號外》全人在八十年代平等開放的語言觀、不拘一格的創造力，以及力圖以書面語言再現本土風貌的意識。筆者希望能指出，既有強烈的本土意識，又對不同的語言保持有容乃大的胸襟，這種語言觀不流於政治化的狹隘，為「複調語境的語言意識」作了示範，能為今天的香港帶來深刻啟示。

徵引書目

一、近人論著

(一) 專書

丘世文、袁忠合著：《慳稅精要：簡易稅務理財計畫》（香港：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1990年）。

丘世文、廖建平合著：《創業經營法則：如何明智選擇業務組織的形式及結構》（香港：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1991年）。

丘世文：《看眼難忘——在香港長大》（香港：青文書屋，1997年）。

丘世文：《周日牀上的顧西蒙》（香港：青文書屋，1998年）。

丘世文：《同行四分一世紀》（香港：突破出版社，1998年）。

丘世文：《周日牀上》（香港：美藝畫報社，2016年）。

丘世文：《在香港長大（增訂本）》（香港：美藝畫報社，2018年）。

丘世文：《尤明實錄》（香港：美藝畫報社，2019年）。

丘東明：《一九二零年代長洲生活記趣》（香港：美藝畫報社，2018年）。

呂大樂：《號外三十——城市》（香港：三聯書店，2007年）。

李婉薇：《清末民初的粵語書寫（增訂本）》（香港：三聯書局，2017年初版；2021年二版）。

胡冠文：《在香港長大》（香港：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1986年）。

陳冠中：《太陽膏的夢》（香港：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1986年）。

譚國基、丘世文：《顧西蒙的信——譚國基與丘世文鴻雁十七年》（香港：青文書屋，2000年）。

顧西蒙：《周日牀上》（香港：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1985年）。

顧西蒙：《周日牀上續集》（香港：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1986年）。

(二) 期刊論文

丘世文：〈略論《號外》語言風格的問題〉，第 226 期《號外》（1995 年 7 月），頁碼不詳。

陳冠中：〈城市語言〉，第 30 期《號外》（1979 年 2 月），頁 5。

(三) 電子資源

「世道文心」（<https://yausaimanjoseph.tumblr.com/yausaimanjoseph>）（上網檢索日期：2021 年 12 月 7 日。）

Struggles of an Intellectual: The Thoughts and Languages of Joseph Yau Sai Man's *Sunday in Bed*

Li, Yuen Mei Fanny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Joseph Yau Sai Man (1951-1998) was a representative Hong Kong writer. There were traces of Hong Kong history in his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writing career. In addition, the language, genres, and themes of his literary works are unique and bring irreplaceable contributions to Cantonese writing and Hong Kong Literature. He received fundamental knowledge of Guoxue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1950s and was fluent in English in colonial secondary education. French Philosophy, European literature, and Russian novels were his life-long interests. Yau was one of the locally born post WWII baby boomers. Starting from this generation, Hong Kong has been regarded as a home rather than a place of migration. As one of the founders of *City Magazine*, Yau's perspectives of language choice represented his subjective awareness as a Hong Kong writer. He proposed that written language should reflect the modern life of Hong Kong, and standard Chinese should not be the single written language for writing and publication. Although he had been an accountant for a very long period, this career had not affected his thoughts and pursuits as a humanistic

intellectual.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literary work of Yau, the novel *Sunday in Bed*, demonstrates his struggles as an intellectual. The deep and conflicting thoughts behind such struggles create tension against commercial society and should be invaluable resources of today's Hong Kong. Although his achievement as writer and his character are always remembered by the local academia, special research outputs of Yau remain few. The paper takes *Sunday in Bed* as a channel to introduce the life and thoughts of Yau, and evaluates his contributions in using "Two Languages and Three Scripts" as a written language.

Keywords: Joseph Yau Sai Man, *City Magazine*, *Sunday in Bed*, Cantonese Writing, Two Languages and Three Scripts, New "Saam Kap Dai", Hong Kong Literature